

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根本转变的依据和途径

李邦君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实现外贸“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我国外贸虽然已取得巨大成绩,但增长方式如何实行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性转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此作一探索研究。

一、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现状

(一) 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启动

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说是与提出经济工作应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同步的。早在1981年11月国务院就提出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实现经济奋斗目标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自此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断强调各项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并把它作为衡量各级经济部门和企业思想上、行动上是否同中央保持一致以及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进入90年代以来,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又提出根本转变的新要求。我国外贸就是在这种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于80年代初开始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并贯穿在改革开放整个过程中,其标志是:

1. 加快外贸企业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

传统体制是影响外贸发展和效益提高的首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市场化改革和外贸发展,我国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独家经营缺乏经营自主权的专业外贸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推广承包制和制度创新等一系列改革,使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专业外贸企业独家经营向各地、各部门发展自营和兴办“三资”企业等多元化经营转变;由小型、分散的企业经营向组建企业集团规模经营转变;由专业外贸企业单独经营向工贸、农贸、技贸联合经营转变;由国家单一投资经营向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投资的公司制经营转变;由国内外贸企业经营向海外投资发展跨国经营转变,在全国已形成多元化、实业化、集团化、综合化、国际化大外贸的新格局。

2. 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机制

价格不合理是影响外贸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采取国内外市场价格割断的政策,即出口商品收购和进口商品内销均按国内价格作价,而出口商品外销和进口商品购进均按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作价。在市场

化改革和经济生活国际化过程中如继续实行内外价格割断政策,就不利于外贸企业经营和经济核算,影响外贸发展和效益提高。国家对高度集中的价格体制和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了改革,使原来的计划价格形成机制逐步转向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也逐步取消了这种价格割断政策。现在,我国进出口商品基本上按照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结合国别政策和销售意图作价原则开展外贸工作。

3. 积极调整不合理的汇率制度

作为联系国内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人民币汇率,由于长期高估,使出口商品价格不能真正反映价值,造成出口成本高于汇率,从而影响外贸经济效益。针对这种状态,从1981年起经过调整官方汇率,实行双重汇率和多次下调人民币汇率等改革后,于1994年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同时,建立外汇交易市场,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这对于改善贸易收支、贸易条件和提高外贸效益产生了积极影响。

4. 改变外汇计划的刚性,增强财务约束力

由于国内经济发展对外汇的需求,使出口创汇指令性计划长期成为考核外贸企业的最重要指标。企业为完成出口创汇任务,往往不讲核算,不计成本,财务约束力弱化。为此,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取消出口创汇指令性计划,实行指导性计划,并把企业经营目标从出口创汇为主逐步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同时,加强财务管理,增强财务约束力。

5. 实施以质取胜战略,不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出口商品质量和结构影响外贸经济效益提高。长期来,我国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卖不出好价钱。根据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需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提出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和优化结构的要求。经过“六五”和“七五”计划时期的努力,出口商品已实现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制成品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在“八五”期间,我国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又着重提出出口商品结构要逐步实现由粗加工制成品为主向以精加工制成品为主转变,努力增加“双高”(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6. 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把外贸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

我国出口产品粗加工制成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一个根本原因是科学技术发展缓慢,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比例不高。因此,按照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努力提高外贸增长中的科技含量和科技进步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

(二) 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成效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上述积极措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因而取得了显著成绩。

1. 外贸增长迅速,外汇储备增加

1979~1997年,我国外贸每年以16%以上的速度增长。进出口额从1978年的206.14亿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3251亿美元,增长近16倍。其中,出口额从181.2亿美元上升到1827亿美元,增长10倍多。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原来的4.6%增加到20%左右,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从原来不到1%上升到目前的3%。贸易地位从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居世界第10位。外汇储备不断上升,目前已达到1400多亿美元。

2. 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

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由于各地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使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在出口方面,传统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从1975年的52%下降

到1995年的14%左右;制成品出口从原来的48%上升到86%。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迅速,从1985年出口16.8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出口48.2亿美元,增长近2.9倍,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85年的6.1%上升到1996年的32%。在进口方面,初级产品进口1980年为69.6亿美元,1995年为244.1亿美元,增幅从1980年的34.8%下降为1995年的18.5%;工业制成品进口1980年为130.6亿美元,1995年为1076.7亿美元,增幅从1980年的65.2%上升到1995年的81.5%。

3. 科技进步,促进了出口商品质量和科技含量的提高

由于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各地纷纷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促进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我国在80年代初还有相当多出口制成品属低档产品,在国外上不了货架,可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有很多产品进入国外超级市场,并逐步进入高档商场。有不少商品质量已达到国际标准,售价也发生了变化。例如,纺织品过去主要是两纱两布和针织品出口,现在中高档服装出口比例不断上升。特别是技术产品出口额逐年增加,这是出口“含金量”提高的显著标志。

4. 积极发展集团经营,规模效益开始显现

针对我国外贸企业多数是“小、乱、散”的实际,各地通过“强强联合”、“强弱兼并”、“以大带小”或“法人参股”等方式纷纷组建不同模式的企业集团。有上海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贸贸联合”模式,也有上海丝绸进出口有限公司和上海金达国际丝绸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上海丝绸(集团)有限公司的“工贸结合”模式,还有厦门罐头厂和厦门塑胶总厂共同投资建立的厦门古龙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法人参股”的综合性外贸集团模式等。这些不同模式外贸集团的涌现,能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取得了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显示出集团经营的优势和“大兵团”的作用。

5. 重视优化经营和加强管理,注意节约开支和降低出口成本

目前,外贸企业把优化经营作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环节来抓。在出口经营上,除了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两高”产品外,注重优选客户、优化市场结构、资源组织和营销收汇,特别注重开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成功地开展贸易、工业(包括科技)、金融、储运、房地产五方面经营,坚持以贸易为主,其他业务与贸易相结合。同时,各地培育骨干商品,围绕骨干商品发展系列化经营。例如,上海实施“龙头商品”计划,到目前已培育80只龙头商品,1997年1~10月累计出口73.76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同期全市出口总额的57.41%。

加强管理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启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当前外贸企业正在克服放松管理,“以改革代替管理”的现象,开始加强财务、投资、质量、成本等管理。东方集团上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首家实行财务电算化后,出口成本大幅度下降,1996年1~11月每1美元出口成本比上年同期降低0.58元。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从1996年起改变个人决定使用资金的做法,由财务进行项目审核。有些公司还加强对宴请、出国、出差、邮件、电话、传真等管理,节约一切开支,如上海兰生集团公司在1996年1~11月仅邮件、电话费就节约60多万元人民币。

从上可见,我国从改革开放初就开始重视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并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而不断加快。正因为如此,我国外贸才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解释近20年来外贸迅速发展的客观事实。

二、我国外贸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依据

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虽然伴随改革开放过程在转变,但尚未根本转变。1995年9月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今后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的关键之一,是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性转变。这也完全符合外贸发展实际。我国外贸发展的现实和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都决定要加快其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所谓外贸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是指外贸发展要真正从数量型转变到质量效益型,从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从劳动密集型转变到资金、技术密集型,从资金、资源和劳动投入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科技含量和科技贡献率的轨道上来,从而提高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加快外贸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依据主要是:

(一) 我国外贸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外贸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资金、资源和劳动的过量投入换来的,仍然是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 出口创汇没有随出口货物量增长而增长,效益不高

发展外贸固然需要扩大出口,但是有些地区和企业一味追求出口数量,忽视经济效益提高。据统计,1988年出口贸易量指数增长141%,而出口贸易额指数只增长94.4%,出口价格指数却下降了11%。以纺织品为例,出口货物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出口金额却只居世界第四、五位。又据报导,内地出口到香港的160多种商品中有120多种售价比应有价格低20%以上。山地自行车的世界合理价为每辆60~70美元,而我们卖给某些国家仅30美元;美国出口到韩国的玉米每吨130美元,而我国出口到韩国的玉米每吨仅90美元;过去我国人参出口每吨曾卖6万多美元,而现在只卖1万多美元。我国出口额逐年增长,但其利润并没有随出口发展速度和规模增长而提高。事实说明,以量取胜的粗放经营,不能增强出口创汇能力和效益提高。

2. 出口成本提高,亏损较严重

由于我国出口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削弱了出口竞争能力,外贸经营不断发生亏损。其中1986、1988和1989年出现严重亏损,亏损额(按官方汇率计算的人民币)分别为94.99亿元、105.95亿元和309.82亿元,从1991年开始外贸又出现全行业亏损,并出现了外贸出口规模越大,亏损越多的现象。同时,还有个别年份(1995)出口增长速度逐月下降,甚至出现个别月份负增长的状态。

3. 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传统商品仍唱主角

我国出口商品长期以来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半成品为主,轻工纺织、土特产品占了很大比重。以1990年为例,排行前5名的出口商品是:原油、矿产品、农产品、纺织品、轻工产品。前三类属初级产品,占当年出口总额的14.3%;后两类属工业制成品,占当年出口总额的28.4%。这5类商品出口额要占当年出口总额的42.7%,而该年的机械设备、化工和电子产品出口额只占当年出口总额的12.5%。轻工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5年的14.6%上升到1993年的33%。1997年上半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双高”产品虽然成了一个亮点,但无论是商品种类和布局,还是在成交上,传统产品仍唱主角。即使像上海这样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城市,出口商品也是以传统的轻纺产品为主。例如,1995年上海

市 15 个专业外贸公司在郊区直接收购的出口商品货值共 77.3 亿元人民币,其中轻纺产品占 70.9%,工艺、食品、文体和五金矿产品占 25.5%,而机械、化工类产品只占 3.62%,可见一斑。

4. 贸易方式落后,不适应科技发展新变化

长期来形成的以货物贸易为主、简单划一、供需见面、成交供货等客上门的“坐商”方式至今尚未改变。各种形式的出口商品交易会这种传统贸易方式的体现和延续。这种贸易方式已受到当代科学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广泛应用的严峻挑战。现代电子通讯、传真、互联网络等先进技术的发展,使国际贸易手段发生质的变化。无纸贸易的开展,各种形式博览会、展示会的流行,而我们仍停留在传统方式上,更新这种落后方式已刻不容缓。

上述问题存在,已严重影响我国提高出口竞争力,制约着我国出口经济效益提高和出口战略目标实现,还有可能在世界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排挤出市场的危险。这足以说明实行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 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挑战

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是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的迫切要求。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出现许多新变化、新特点。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外贸发展比较有利,但是,机遇与挑战是同时并存的。我们在看到有利的因素的同时,应该看到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存在许多对我国外贸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是:

1.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加快,贸易保护主义加强

区域经济集团化出现,虽然对其成员国存在有利的一面,但由于谋求集团共同利益,明显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大我国商品进入这些市场的困难。

2. 发达国家歧视政策干扰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加剧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尽管继续向多极化发展,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少数发达国家将经济关系政治化却日益严重。它们从其战略利益出发,对我国不断变换政策,阻挠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不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鼓吹“中国威胁论”,在贸易上制造反倾销案件,实行贸易制裁,有的顽固地认定我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断制造摩擦和对抗。

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周边国家的产品出口竞争能力越来越强,它们在设备、技术、原料等方面并不比我国落后,有的国家先进设备的比率比我国还要高,产品质量不差,劳动力成本反而比我国低,因此它们在国际竞争中有相当实力,这是我国出口竞争难以招架的困难。

3.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去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还未消除。尽管我国对其采取积极防范措施,但对我国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原因,一是东南亚及其受影响国家的国内需求收缩将减少对进口需求,这无疑对我国出口到它们国家的产品不利;二是这些国家货币贬值将提高它们产品出口竞争能力,而我国货币币值稳中有升,这显然给我国产品出口增加更大的压力;三是我国出口结构与东南亚相比并无明显优势,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型产品占有很大比重,技术含量低且替代性强,出口产品结构有重叠,这使我国产品出口到欧美等市场上将遇到强劲的对手。

此外,我国技术比较落后,产业(产品)结构改变慢,在当代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贸易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不小。

正确分析和足够估计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因素,以勇敢的姿态迎接挑战,克服前进中种种困难和阻力。只有这样,才能驾驭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新趋势,才能适应世界产业(产品)结构趋向高级化、国际贸易快速发展、贸易格局和方式新变化,抢占国际贸易制高点,使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增长中保持领先地位。

三、我国外贸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途径

根据我国外贸增长的现状和面临的国际挑战,今后应围绕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快外贸增长方式根本转变。其途径主要是:

(一) 加快企业改组、改造和联合,实现规模经营

企业联合和兼并是一种国际现象。1995 年世界兼并值已达到 8000 亿美元。我国现有各类经营外贸企业约 1 万多家,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有 12 万家,但进出口额数量超过 2 亿美元的企业仅 120 家,超过 10 亿美元的仅 7 家。这种状态,不仅同国际企业发展趋势相违背,而且由于企业规模小而分散,还经常发生不规范的竞争,削弱国际竞争力。改变这种状况的有效途径是实行改组、改造和联合,实现规模经营、节约成本增加利润、提高抗风险能力,是市场经济要求。实现这个要求,与企业规模是否合理有密切关系。一般说来,规模较大的企业单位产品资本耗费低,获利大、抗风险能力强。通过对现有外贸企业改组、改造和联合,把分散的小型企业发展为规模较大的企业,实行综合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能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的创汇型向集约的效益型转变。

目前全国各地正在实施外贸规模经营战略,积极进行国有外贸企业战略性改组,已组建一批企业集团,这是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和发展趋势。但是,目前建立的企业集团属松散型、外贸联合较多。今后应按照十五大精神,以资本为纽带,既推动贸贸联合,又推动贸、工、农、技、银的联合;既实行强强联合,又实行强弱联合,积极创建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紧密型企业集团。不论采取哪种联合方式组建企业集团均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采用公司制,明晰产权关系,实现规模经营。

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表明,在外贸企业改组、改造和联合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强调规模经营,不是千遍一律地把中小企业均改造成为大企业而不允许中小企业存在和发展。应该看到,大中小企业各有其特点,它们存在相互配合和专业化协作关系。大中小企业并存发展是各国存在的事实。我国在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过程中也应注意这个问题。根据我国的实际,组建大型集团公司为骨干、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外贸组织结构,共同跻身于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对推动外贸新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有积极作用。

(二) 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外贸科技含量

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技术创新,是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加工深度和科技含量的关键,是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目前正由主要出口粗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深加工制成品转变,应该说,这比过去从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转变的任务更艰巨、难度更大、要求也更高。这只有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要求,进行技术创新,把科学技术纳入生产过

程之中,与物质生产中各个要素紧密结合,促进产品质量、等级提高。通过“创新”,节约资本,促进外贸出口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效益型转变。

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特别要扩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双高”产品出口。同时,要发展技术出口,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提高服务贸易比重。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也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提高质量,降低造价,提高工程创汇额和利润率,输出劳务要提高技术层次,优化劳务人员结构,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资金和劳动换回尽可能多的外汇。

与此同时,要加快先进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目前进出口商对开展电子贸易联络欲望强烈,我们要适应这种新形势,加快外贸工作现代化过程,加快电子通讯、互联网络建立,提高外贸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软科学的含量。

(三) 实施“以质取胜”战略,推动外贸向质量效益型发展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是占领市场、开拓市场、改善贸易条件、突破地区集团化、贸易保护主义的前提,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关键途径。

提高产品质量,包括产品品质、规格、品种、花色、档次,以及服务等各方面。这需要增强质量意识,树立以质取胜观念;需要挖掘潜力,杜绝浪费,减少报废率;需要提高产品档次和规格,改进包装装潢,加强售后服务;需要变粗加工为精加工,改进和提高技术水平,提高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需要创名牌,管好、用好商标,努力提高优质名牌商品出口比重。

对产品质量要进行综合治理。这需要外贸主管部门、外贸企业及银行、物价、商检和海关等部门齐抓共管;需要生产部门、科技部门和外贸部门相互配合;需要各部门、各环节层层把关,防止假冒伪劣商品混进出口市场。只要各方面把提高产品质量放在重要位置,共同为提高质量而努力,就一定会以更多的优质名牌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使我国外贸在新形势下获得新发展。

(四) 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推动出口市场结构合理化

出口市场过于集中,是我国外贸出口受到一定限制的重要原因。近些年来,虽然正在改变市场主要集中于亚太地区和发达国家的状况,对非洲、拉美国家的贸易额有一定发展,但其出口的绝对值仍然很小,增长幅度也赶不上对发达国家出口的增长。我们要根据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进程正在加快的趋势,加快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步伐。

为加快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既要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市场,又要开拓新市场。由于各国经济技术、人文风貌、学识素养、情趣爱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同,必然引起市场上商品结构多层次、品种多样化、需求多样性。要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各地区市场需求和商品结构,制定落实市场多元化战略策略,根据市场需求发展出口生产并打入新市场。在改造、开发市场需要的多种出口商品的同时,合理规划发展海外企业的布局,把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推向重点开发市场,建立贸易、组装和售后服务等海外企业,推动市场多元化战略实现。

(五) 加快复合型外贸人才培养,提高外贸发展水平

外贸增长方式根本转变,说到底人才问题。目前外贸领域在人才问题上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现有外贸人员没有很好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二是适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特点所需要的

人才紧缺。因此,要按照邓小平关于智力开发和人才理论,做好人才资源开发,加快外贸复合型人才培养,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长远之举。

我国外贸增长方式根本转变,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国际贸易不是单纯看样定货的“小外贸”,而是工贸、技贸、银贸等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大外贸”。从事这种外贸工作,只是懂外语、掌握一般进出口贸易知识和业务是不够的,必须既懂外语、懂外贸业务、懂国际商法,又懂工业、农业、科技、金融投资和房地产开发等基本理论和业务知识,以及国际政治和各国风俗习惯,这就是所谓“复合型”人才。目前这种人才紧缺,不适应贸易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知识经济发展很快,外贸发展越来越取决于知识与人才,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新形势下,应把加快复合型人才资源开发与培养,作为外贸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首要任务,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要做好复合型外贸人才开发这篇大文章,必须做好这样几方面工作:(1)建立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这必须增强创新意识,改革不合时宜的传统用人制度,努力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竞争、择优的人才开发机制;(2)对现有外贸队伍作认真分析。目前外贸队伍有一大批大专毕业生,存在忙闲不均,知识结构不平衡等情况,应根据外贸发展需要和队伍状况,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加强培养和合理使用;(3)对外贸人才需求作出科学预测与规划,加强重点培养和配置。除加快培养复合型人才外,还要做好高级外贸管理人才培养工作,培养造就一支同跨世纪外贸新发展相适应的经营队伍,把外贸发展提到一个新的水平。

(六) 建立健全宏观调控机制,优化外贸经营环境

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固然需要外贸企业本身努力,但是外部环境是否优化也很重要。目前外贸体制正在根本转变过程中,对出口既取消出口货源计划调拨和出口补贴,又下达出口创汇指标;既要完成创汇指标,又要实现利润。对这种过渡性体制,外贸企业感到像在夹缝中运作一样,很艰难。内部搞不正当竞争,不惜抬价收购,低价竞销等行为发生,源出于此。因此,应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尽快建立健全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采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综合治理外贸经营秩序。要纠正依靠行政手段和计划手段来推动外贸出口增长的做法和倾向,让企业切实从计划执行者向自我发展,自负盈亏转变,从单纯出口创汇型向效益型转变,把促进出口增长的宏观调控机制真正建立起来,为外贸企业经营创造优越的外部环境,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必须指出,外贸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外经贸体制相配套。这两者之间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外经贸体制经过几轮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对推动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已收到一定效果。但是,现行体制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国有外贸企业机制转换滞后,宏观体系尚未完善,进口管理体系还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等。这些均制约我国外贸增长方式根本转变。因此,必须按照邓小平关于“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的思想,按照“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进一步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建立统一规范的外经贸新体制。只有加快外经贸体制根本转变,才能促进外贸增长方式根本转变。只有加快“两个根本转变”,才能推动我国外贸事业在新时期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促进我国发展外贸水平有一个新的提高。这样,我国对外贸易就将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21世纪。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